

S O R S T A L A N S A Q

2002年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作品

无命运 的人生

KERTÉSZ
JIMRE

[匈] 凯尔泰斯·伊姆雷 著
许衍艺 译

45



上海译文出版社

THE
SUNSHINE
SUNSHINE

THE
SUNSHINE
SUNSHINE

THE
SUNSHINE
SUNSHINE

THE
SUNSHINE
SUNSHINE



THE
SUNSHINE
SUNSHINE

O R S T A L A N S A G

IT15.45
Y4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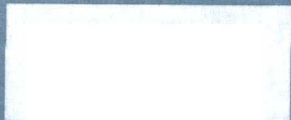
2002年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作品

无命运 的人生

KERTÉSZ
MIKE

[匈] 凯尔泰斯·伊姆雷 著
许衍艺 译

PA1582/08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命运的人生/(匈)凯尔泰斯·伊姆雷(Imre,K.)著;
许衍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12

书名原文:Sorstalansag

ISBN 7-5327-3222-3

I. 无... II. ①伊... ②许... III. 长篇小说—匈牙利—现代 IV. I51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3482 号

图字:09-2003-056 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SORSTALANSÁG

Copyright © 1975 by Imre Kertész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Rowohlt. Berlin Verlag GmbH, Berlin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无命运的人生

[匈牙利]凯尔泰斯·伊姆雷 著
许衍艺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72,000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7,000 册

ISBN 7-5327-3222-3/1·1878

定价: 16.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为了回忆的持续

(译者序)

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雷(注:匈牙利人名习惯为姓在前名在后)1929年11月9日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个小商人,但家境并不宽裕。5岁那年,父母离异,后来又分别再婚。凯尔泰斯日后回忆道:“我有四个父母,但我却在教养院里。”儿时的这种生活经历与《无命运的人生》中少年柯韦什的经历颇为相似。凯尔泰斯不懂希伯来语,不识犹太习俗,对于犹太教亦知之甚少,他始终强调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是被外界“强加”到他头上来的。1944年,14岁的凯尔泰斯被投入奥斯威辛集中营,后被转至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5年,美军解放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回国后,凯尔泰斯从事过体力劳动,当过报社的记者。在匈牙利极左路线统治时期,处于苦闷和无聊中的凯尔泰斯也曾迫于生计写过一些娱乐大众的轻歌剧。一次偶然的机会,凯尔泰斯接触了托马斯·曼的作品,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随即四处收集并潜心阅读这位德国作家的著作,很快,凯尔泰斯开始写作了。对于许多问起他的集中营经历的人,风度儒雅、人情洞达的凯尔泰斯只是讲讲他们想听到的奥斯威辛,但从未触及那

些深深埋藏在他心底的东西。只有当他开始写作的时候,他才重新回到那个被他“忘记”了的世界里,而这些作品也总是无一例外地指向他所经历过的恐怖和专制极权。《无命运的人生》这部 14 万字的小说从构思到脱稿历经 13 年时间(在此期间凯尔泰斯还创作着其他作品),于 1973 年完成,但直到 1975 年才得以出版。小说出版后反映平平,也没有给作家带来他所期望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失望之余,凯尔泰斯在自己简陋的蜗居里完成了《失败》(1988)和《给不曾出生的孩子的哀祷》(1990)。这三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柯韦什·久尔吉,一度被人们看作是凯尔泰斯的三部曲。2003 年 9 月,凯尔泰斯出版了新作《清盘》,为他的种族大屠杀小说划上了一个句号,也使得他的作品最终构成了一个四部文集。1989 年东欧剧变之后,凯尔泰斯得以公开地活动,他的一些演讲和随笔被收集整理成《作为一种文化的大屠杀》(1993)、《行刑队再次上膛前的瞬间静默》(1998)以及《被放逐的语言》(2001)。凯尔泰斯的其他作品还有:《寻踪者》(1977)、《英国旗》(1991)、《苦役日记》(1992)、《笔录》(1993,与另一位匈牙利作家埃斯泰尔哈兹·彼得合著)、《另一个人:演变编年史》(1997)等。作为翻译家的凯尔泰斯曾译介过尼采、霍夫曼斯塔、施尼茨勒、弗洛伊德、洛特、维特根斯坦、卡内蒂等人的德文著作,这些人均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 20 世纪 80—90 年代起,凯尔泰斯陆续荣获了包括德国勃兰登堡文学奖(1995)、莱比锡书展大奖(1997)以及匈牙利柯苏特奖(1997)等在内的多项国际国内文学大奖。2001 年被授予代表德国文艺界最高荣誉的“功勋奖章”。

2002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凯尔泰斯现旅居德国柏林,他所有的作品均已被译成德文出版。

凯尔泰斯的作品不断重复着奥斯威辛的主题。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有句名言:“奥斯威辛之后不可能写诗。”凯尔泰斯将这句话解读为:“奥斯威辛之后只能写奥斯威辛的诗。”种族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包罗了历史意识的本质、回忆的可能性与意愿无法传达的经验,以及忘却的必要性等诸多问题。回忆与树立纪念、理解与使人理解在此面对着其自身的不可能性。那些视回忆的持续为道德己任的人常常受困于传承的迫切需要与媒介的无能为力之间。凯尔泰斯曾在《奥斯威辛属于谁?》一文中指出,在种族屠杀问题上形成了大屠杀感伤主义、带有禁忌体系的大屠杀经典及其仪典般的语言世界,形成了大屠杀廉价商品,甚至还形成了对大屠杀的否认。为我国广大观众所熟悉的电影《辛德勒名单》创造了一个大众神话,在这神话中,关于罪犯与牺牲者之间的界限、反抗与幸存的关系等许多敏感问题都被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种族大屠杀被降级为仅局限于德国纳粹分子与犹太受害者之间的问题。这部黑白片结尾的彩色镜头暗示着人类跨越了恐怖,过去被抛到了身后,人文主义理想得以安然无恙地永世长存下去,凯尔泰斯因此称其为一部拙劣之作。另一部电影《美丽人生》为牺牲者与幸存者之间的道德关系提供了一个悲喜剧——通俗剧式的视角,凯尔泰斯说:“这部电影将这个可怕的世界的一切荒谬都告诉了我们,而在这无奈面前无能为力的脆弱的人却依然具有着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它只是个“童话”。种种层出不穷的

传达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了有关种族大屠杀表述的最基本问题，即无法描述性及独一无二性、归根结底为可理解性的困境。凯尔泰斯，这位将几乎所有的作品都贡献给了回忆之持续的作家这样写道：“对于种族大屠杀这一无法理解、无法纵观的事实，我们惟有借助于美学想象才能真正地建构想象。”可以说，《无命运的人生》这部作品正是通过实现奥斯威辛经验的持续化而保持了对于大屠杀的被迫道德反思。

20世纪70年代初的匈牙利文坛，各类大屠杀题材的文艺作品均受制于反法西斯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在创作上以传统的语言再现观念为基础，强调语言中介的“透明性”，不注重文学的表现手法。《无命运的人生》由于没有满足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真实再现原则的要求，缺乏意识形态上的“声讨”，所以在出版后遭到了冷遇，此外，其古怪的风格也令评论界不知所措。随着“语言学转向”对文学的影响逐渐扩大，到了80年代，匈牙利国内开始有人尝试着重新诠释《无命运的人生》，并有评论家视其为一部后现代主义的作品。

《无命运的人生》虽篇幅不大，却令人百读不厌。其中的妙处就在于，小说在铺陈事件的同时，通过一个有着独特身份及语言的讲述者的声音，对（生活）故事之关联性、回忆与纪念物、话语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话语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从个人与集体的记忆及评判道德问题的角度来说，这一点才是最为重要的。

在凯尔泰斯后来的自我分析文章中可以读到，作家认为传达

奥斯威辛的首要条件不是进行真实的描摹,而是要找到一种语言使用形式、一种中介,以便能使奥斯威辛作为一个过程、作为一个一步步实现的(从前因实际上是推导不出来的)事件显现出来。《无命运的人生》旨在搭建一个考察对于奥斯威辛的态度、重新思考其意义(无意义)、发掘各个不同视角的潜在意义并使之相互对照的平台。作品挑战了语言的承载能力,展示了美学经验的力量。

《无命运的人生》的主人公是一个十四岁的犹太少年柯韦什·久尔吉。他以一种特有的、犹疑而迂曲的方式讲述了1944年春他的家庭送父亲去劳动集中营、两个月后他本人在上班途中被抓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然后转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又从那里去了蔡茨集中营,后来被遣送回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最后于1945年春与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一起返回匈牙利的故事。在久里(久尔吉的昵称)的讲述中,集中营的生活如同单调乏味而又真实的日常生活一样,有苦痛,有无聊,也有欢愉与幸福。与其他所有的犯人一样,久里也在一步步地适应着集中营里越来越恶劣的生活条件,直至他的身体严重衰竭,最终他放弃了生的抗争。但就在此时,完全出乎他预料的是,集中营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们对他进行了救治和照料,这让长期生活在惊恐与怀疑中的少年百思不得其解。少年生存了下来。回到家乡后,久里发现,发生过的一切无法传达,在牺牲者和局外人之间存在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站在两个时代交替的门槛上,少年带着他的过去,准备继续他那“无法继续的生活”。

《无命运的人生》是一部自传式成长小说。主人公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少年人命运的形成则大体上符合成长小说的基本结

构。成长教养类小说或记录少年如何经历时间的磨练演化为成人的过程,或追索个人如何在历史变迁中与历史一同成型,直至完全脱胎换骨,个性在顺从中获得理性的升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柯韦什的社会化过程却是在集中营的世界里完成的,他在个性形成过程中所学得的实质上是这个世界的秩序,并与之形成了特有的和谐。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种学习——顺应过程中发生的。在小说中,柯韦什要学习的不是欧洲文化中一脉相传的人文知识,而是奥斯威辛的世界,是“支柱”的坍塌,是与此前世界经验的粗暴决裂,是文化摧折的认知体系,是宣告了先前之道德考虑通通无效的“谋杀”准则和“幸存”策略。通过少年柯韦什的个性形成的遭遇,奥斯威辛的历史存在展现在我们眼前。当柯韦什回到家乡时,他将这种“教养过程”视作已结束的、最终有效的和无可逆转的,不能够否认它已经发生过:“新的生活——我认为——只有在我重新诞生或是我的大脑出了问题、患了病时才有可能开始,我想他们也许并不希望看到后一种情况……我们决不可能开始新的生活,我们永远只能继续把旧的生活过下去。”小说最震撼人心的一刻是柯韦什重返故乡后,体会到了无法使他人理解,这时他对集中营产生了思乡之情:“即使是现在,即使是在这里,我也认得出它——这就是我在营地最喜欢的那个特别的一小时,此后有一种尖利的、痛楚的、徒劳的情感攫住了我的心:是想家了。一下子,一切都鲜活了起来,一切都在这时涌上了我的心头,它古怪的氛围完全淹没了我,那些琐碎的回忆让我颤抖不已。是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里的生活更清楚、更简单。”

久里的话语里存在着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体现在主人公对于常规感情态度及道德评判观点的疏离。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在久里的讲述中混杂着各种各样的、非其本人的声音,在其评论言语里包含着各种视角的切换,甚至是与陌生视角的同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柯韦什·久里不像是一个完全“真实的”人物形象,而更像是一个变动不拘的视角,承担着媒介的作用:主体实际上消融在一片陌生的声音中了。小说要传达给我们的寓意是:不仅命运无法选择,个体性也是无法选择的。

与角度切换密切相关的是人物的身份问题。《无命运的人生》与其说是一部奥斯威辛小说,毋宁说是一部无命运的小说。柯韦什·久里无命运的人生在家的时候就开始了:一方面,他不能够自由选择自己家庭中的亲人,另一方面,在犹太人身份的问题上他也被剥夺了决定权。后来混杂在集中营的囚徒群体中,柯韦什·久里的犹太人及匈牙利人身份仍旧是个问题。像父兄一样关照着久里、帮助他在集中营里生存下来的柠檬邦迪执著于自己的匈牙利人身份,并以此作为自己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而久里却不能够从匈牙利人的身份中获取力量。但那些同样来自匈牙利、总在做着买卖、遵奉犹太教教义的“芬兰人”(注:对集中营里的正统犹太教徒的戏称)也让他感到陌生,这些人则对他的犹太人身份表示了质疑。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医院里,语言与命运上的相同显现出相对性,身份的交叉、沟通的无法实现成为了突出的问题。柯韦什·久里感到,此时他不是因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是因匈牙利人的身份而受到了歧视,但他对于这种身份的排斥却又只

能通过“杀人犯们的语言”进行传达。在自我身份确认的问题上，有一点值得一提，在小说中，读者从未“听到”过柯韦什·久里亲口说出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每次都只出现在引语里：一次是他爸爸与他亲妈通电话时提到了他的名字，还有一次是他在工作通知书上读到了自己的名字，第三次是在集中营的医院里，他很困难地想起了自己的名字，又经护士用“集中营的语言”改写成了“克维什杰尔德”，至此他的名字及其中所包含的民族性已经变得不可辨认了。重返布达佩斯后，久里在与邻居们的一番谈话中指出，“犹太人”的没有命运其实并非必然：“现在我已经能够告诉她，‘犹太人’有何含义：没有任何含义，至少对于我来说，起初它没有任何含义，直到开始走那些路为止。全都不是真的，没有别的血统，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只有……一定的境况以及存在于其中的一定的新境况。我也从头至尾地把一个一定的命运经历了一遍。那不是我的命运，但我从头至尾地把它经历了一遍……”

《无命运的人生》采用了日记式的叙述角度，在叙述过程中大量使用了准现在时。叙述的我不是站在后来的角度阐释被叙述的我的经验，而是通过尽量地靠近并与被叙述的我同一的方法来重现当时的观点。准现在时的运用隔绝了后来的知识视野，限定了主人公的历史渐进经验，同时消除了读者预先的（准确地说是后来的）意识形态的考虑，逐步将其“领进”了奥斯威辛的机制中。凯尔泰斯本人将《无命运的人生》称作“语言批判小说”，因为它颠覆了奥斯威辛的意识形态话语。同时，作者也很清楚，语言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因此并不试图寻找到一种恰当的奥斯威辛情节形

式,也不企图直接为读者提供真理,而是尝试着在(语言的)运动中、形成中捕捉到一种可怕的机制,并使之成为读者理解。

《无命运的人生》这部小说以其出人意料的主题和形式、不同的准则、开放性以及充满疑惧的玩笑给它的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为匈牙利及欧洲历史记忆的更新构建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译者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匈牙利语专家龚坤余教授、匈牙利专家郝伊纳尔·拉斯洛(Hajnal László)先生的指导与莫大帮助,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丈夫加尔·盖尔盖伊(Gaál Gergely)先生对我无处不在的支持与鼓励。匈牙利语是一个小语种,由于条件所限,在翻译方面遇到了不少困难;加之时间仓促,虽然译者尽了很大的努力,但书中谬误与不妥之处仍在所难免,恳请广大的读者与匈牙利语界同行们不吝指正。

译 者

2003年10月于北京

今天我没有上课。也就是说我去学校了,但只是请班主任允许我回家。我把我爸爸的信也交给了他,信中称“家里有事”,请老师准我的假。他问,家里到底有什么事?我告诉他说,他们召我爸爸去服劳役了;于是他不再追问下去了。

我没有回家,而是急忙朝我们家店铺的方向赶去。我爸爸说,他们在那儿等我。他还补充了一句,要我快点儿,因为可能会需要我。事实上,他是因此才给我请假的。也有可能是为了让我“在他离家之前的这最后一天能够待在他的身旁”:因为这句话他也说过,不过,的确是在另外一个时候说的。是对我妈妈说的。我记得,是在早上他给她打电话的时候。要知道,今天是星期四,在这一天,以及在星期天,严格地说,我的下午是属于我妈妈的。但我爸爸告知她:“我今天无法让久尔吉到你那里去”,这时他提出了这个理由。不过,也有可能不是这样的。今天早上我有点儿瞌睡,因为夜里有空袭警报,也许我记错了。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他说过这句话。如果不是对我妈妈说过,那就是对别人说过。

我也和我妈妈说了几句话,但已经记不起来的是什么了。我觉得,她生我的气了,因为当时有我爸爸在场,我被迫简慢了:毕竟,今天我应该照顾他的心情。当我已准备好要出门时,我的后妈还同我在前厅里讲了几句私密的话。她说,在这样一个对于我们来说非常不幸的日子里,她希望“能够看到我有合适的表现”。

我不知道,对此该说些什么,后来什么也没有说。但或许她误解了我的沉默,因为她马上说道,她的这番提醒并不是要触动我敏感的神经,她知道,那也是多余的。因为她不怀疑,作为一个快十五岁的大男孩,我自己也能够感受到我们所遭遇的沉重打击。我点了点头。我看到,对此她就已经满足了。她还朝我这个方向抬起了手臂,我已经开始害怕了,她不会是想拥抱我吧。但后来她还是没有这么做,而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声音有点发抖。我发现,她的眼睛也湿润了。真令人难堪。随后我走了。

我从学校走到了我们家的店铺。这是一个明净的、温暖的早晨,尽管现在还只是早春。我本打算将衣扣解开,但转而想到:风会把外套的前襟吹得翻转过去,盖住我的黄星^①,那是不符合规定的。如今在有些事情上,我得考虑得周全些了。我们的木材储藏室就在附近的一条小巷里。我沿着陡峭的楼梯走到了下面的一片昏暗中。我爸爸和我后妈都在办公室里:一个狭小的、鸟笼般的玻璃亭子间,就在楼梯旁边,里面的照明和鱼缸里的一样。苏多先生也和他们在一起。我起初认识他时,他还是我们家雇佣的会计,也是我们另外那个露天仓库的保管员,现在那个仓库已经被他买过去。至少我们这么说。因为苏多先生在种族方面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不戴黄星,而所有这一切,据我所知,实际上只是一种商业把戏,目的是让他看守住我们在那儿的财产,此外,在此期间我们也

① 1944年4月5日起,所有年满6岁的匈牙利犹太人都必须在上衣左前胸佩戴鲜黄色的六角星。

不必完全失去收入。

但我同他打招呼的方式还是和以前有了一点儿不同，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讲，他的地位毕竟比我们的高了；我爸爸他们和他在一起时也比过去注意了。然而，他却更加固执地继续称呼我爸爸为“老爷”，称呼我后妈为“亲爱的、尊贵的夫人”，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也从不忘记吻她的手。他招呼我时也是用过去那种半开玩笑的声音。我的黄星他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到。之后我就待在了原地，站在门边，而他们则接着忙他们的。我发现，我的到来正好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一开始，我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我把眼睛闭了一会儿，由于上面的阳光的缘故，我这会儿仍有点儿目眩。当我重新睁开眼睛时，我爸爸已说了一番话，在苏多先生的棕色圆脸上（他留着窄细的髭须，两颗大白门牙中间有一条缝隙）布满闪动的橘红色光圈，好似溃烂的脓包。下面的一句话又是我爸爸说的，他的话里提到了什么“货物”，它“最好”由苏多先生“马上带走”。苏多先生没有表示异议；于是我爸爸就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来一个包裹，是用绢纸包着的，还扎上了细绳。这会儿我才看清那到底是什么货物了，因为从它扁平的形状上，我立刻辨认了出来：里面包的是一只盒子。那盒子里装着我们家的首饰细软之类的东西。我甚至还认为，他们就是由于我的缘故才把它称为“货物”的，以免我认出来了。苏多先生立即把它放进公文包里。然而，随后在他们之间却发生了一点儿小小的争论：苏多先生取出了他的钢笔，无论如何要给我爸爸开一张“货物”的“收条”。他坚持了许久，尽管我爸爸已经告诉他说：“不要这样小孩子气了。”还

说：“你我之间不需要这个。”我发现，此话颇令苏多先生受用。他马上说道：“我也知道您信任我，老爷；但在实际生活中，一切都有自己的秩序和规矩。”他想让我后妈也帮他的忙：“不是吗，尊贵的夫人？”而她，嘴角带着一丝疲惫的微笑，只说了句：这个问题她完全交给他们男人们去处理了。

这事儿已经让我有点厌烦了，但最终他还是把钢笔收了起来。此时他们又开始絮叨起这儿的这个仓库的事儿：该怎么处理这里的许多木板。我听到我爸爸说，得抓紧，以防政府“万一把商店占了去”，他请苏多先生利用他在生意上的经验和专业方面的知识，在此事上多关照我的后妈。苏多先生立即转身对我的后妈说：“这是不言而喻的，尊贵的夫人。我们终归也是会经常联系的，因为结算的缘故。”我想，他指的是他那儿的那个仓库。过了许久，他终于开始告别了。他脸色沉郁地、长久地摇动着我的手。尽管如此，他认为，“此时已不容我们讲太多的话了”，因此他只有一句临别的话语要对我爸爸说：“早日再见，老爷。”我父亲带着一丝苦笑答道：“但愿如此，苏多先生。”与此同时，我后妈打开了手袋，从里面取出一块手帕，径直举到了眼前。她的喉咙里发出了某种特别的声音。周围一片沉静，场面十分难堪，因而我突然觉得，我也应该做些什么。但是这件事来得太突然，我脑子里一下子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我看到，苏多先生也很窘困。“尊贵的夫人，”他说道，“不要这样，真的不要这样。”他看上去有点儿受到了惊吓。他弯下腰来，嘴几乎快要凑到我继母的手上去完成一贯的吻手礼了。之后，他连忙朝门口走去，我几乎来不及从他的面前闪